

总主编 孙玉琴

..... (第一卷)

孙玉琴 赵崔莉 著

中国

对外开放史

History of
China's
Opening-up
to the Worl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总主编 孙玉琴

中国对外开放史

(第一卷)

孙玉琴 赵崔莉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开放史. 第1卷 / 孙玉琴, 赵崔莉著. —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663-0523-7

I. ①中… II. ①孙… ②赵… III. ①对外开放 - 经
济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6200 号

© 2012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中国对外开放史 (第一卷)

孙玉琴 赵崔莉 著

责任编辑: 赵 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60mm × 230mm 22.25 印张 376 千字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0523-7

定价: 58.00 元

总序

ZONGXU

中国对外开放史的研究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随，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开始对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掀起了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由此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使人们对早期中国对外交往的路径、形式及内容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及学术自由度的提高，对外开放的研究开始扩展到 1840 年以后，一些学者利用丰富的史料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制度、洋务运动、近代产业的发展、买办、外资及国际收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不少富有创见的新观点。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学者在近代中国外资与工业化、对外贸易与近代市场的发育等问题上亦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20 世纪 90 年代末及本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开始引起学术界重视，但鉴于 1978 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现有研究更多偏重于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开放史，关于 1949—1978 年间的对外经贸研究的重要成果不多，且对 1978 年以后的研究亦大多集中于对外开放成就的总结、政策及其演进的描述，缺乏历史的纵向视野和客观评析。一些学者也曾对历史时期的中国开放与封闭问题进行过全面探讨，但由于历史学与经济学的长期割裂，一些研究方法相对陈旧，且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其成果基本属于过程性描述。另外一些研究虽有理论指导，但史料占有不充分，其结论多为逻辑演绎，缺乏实证基础。与此同时，一些重大的概念及理论始终模糊不清，如对外开放是否仅是一个近现代概念或是否是近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等论题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对外开放的核心——对外贸易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具有怎样的效应？一国政府选择开放或封闭的基础是什么？迄今尚未有明确的解释。

因而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不仅可以全面、系统阐释中

国对外开放历程，而且可以反映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作用，为对外开放理论研究提供实证基础，为经济史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建设提供学术基础，从而有助于揭示国家兴衰的动因，亦为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此，我们编写组全体成员，在充分吸收学术界既有成果基础上，历时数载深入挖掘、利用丰富的史料，综合运用历史学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及其演进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基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对外开放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形成了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对外开放史》。

本书在内容上涵盖了从两汉至今两千余年的中国对外开放与封闭历程，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脉络，从中勾画出中国从陆路开放到海路开放、再到闭关自守，从被迫开放到封闭与半封闭，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发展轨迹，对各个历史时期对外开放或封闭的社会经济基础、动因及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对外贸易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因而本书研究重点是开放或封闭下的对外贸易（近代以来还包括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同时亦对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效应进行了相应探讨。

自古代到当代的中国对外开放史研究表明，对外开放不仅存在于近现代，古代社会封建王朝亦有积极主动地对外交流，有着一定的商品及劳动力的国际间流动，通过对外开放中国不但向世界输出了自身先进的生产技术、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且引进了域外文明，促进了本国本民族文明的丰富与发展。一国政府是否选择对外开放主要决定于国家安全^①。时间越早，中外经济联系不甚密切之时，国防安全、文化安全的决定作用越大。其开放与否及开放的程度受国家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制约，开放的经济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在自然经济体系下，对外开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使在号称高度开放的唐朝亦有较强的封闭成分。近现代以来，对外开放与否及开放水平高低更多受一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的左右。

本书由多位中青年学者共同研究完成，总主编对全书从体例到内容进行了系统整合，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主要有：孙玉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主要负责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近代、改革开放后到入世前各章节）；赵崔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负责明代及清前期各章节）；

^① 包括国防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等。

申学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负责鸦片战后到1949年前部分章节）；曲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各章节）；孙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负责“入世”后部分内容）、李玉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研究员，负责“入世”后部分内容）。全书由总主编负责统稿，为使全套书保持学术风格的统一，总主编对各位学者提供的文稿在内容上进行了取舍、补充与整合，本书的学术贡献均归功于各位作者，在编纂过程中的不当之处由总主编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魏明孔研究员、吴慧研究员、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夏秀瑞教授、安徽历史学会会长王世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研教授和陈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研究员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中央财经大学的孙洪升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张晓锋教授参与了本书的讨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庄小霞、邵育欣、曹婷婷、张会芳、徐熙、高岳、陈丹、张付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高菲、李军，硕士研究生梁艳、任思颖、王海宁、王辉、王丽霞、程君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陈力琛等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也提供了帮助。本书涉及文献极其繁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批年轻的学子在资料的后期核查上作出了贡献，他们是硕士研究生江笛、关晨、胡瑶、吴晓东、王燕、丁舒婷、杜萱、肖鋈、剧亮静、白点点、梁中贤、邓娟、聂春红、杨昕群等，本科生张倩、范宇、吴瑞娜、张皓博、姚远晨、王梦怡、张春红、刘申、刘文龙、林怡婧、杨硕等，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完成还要特别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两位副校长林桂军教授、赵忠秀教授，他们对本书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我们同样要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优秀的编辑们，刘传志、姜勇和李晨光老师一直对本书保持着积极鼓励的态度，并以他们高度的智慧与洞察力为本书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责任编辑赵昕、阮珍珍、张姗姗老师以他们专业的经验对本书进行了细致而准确的审读，为本书的修改完善提供了中肯的意见。

限于作者功力，书中谬误及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玉琴

2012年7月于北京

前言

QIANYAN

中国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对外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

本书是《中国对外开放史》的古代部分，涵盖自两汉到鸦片战争前两千余年中国开放与封闭的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包括：各个时期对外开放或封闭的社会经济基础；两汉——隋唐中国早期对外开放孔道的形成、发展、转移及绩效；宋元对外开放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对外开放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逆转、“闭关锁国”政策形成、演变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西汉武帝时期基于国防安全畅通了丝绸之路，客观上带来了中国早期非自觉地开放。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早孔道，通过古老的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境外国家和民族展开日益广泛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中国由此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开放。两汉时代的对外开放，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开展，产生了多重效应。这一时期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直接获益者为少数贵族阶层，但通过贸易活动，中国引进了大量域外物种，从而丰富了中国农作物品种，有益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即在贸易规模有限的条件下，尽管贵族阶层从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但普通民众的福利状况也有所改善。

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国，先进的生产技术随着贸易的开展逐渐输出，但由于垄断或居间垄断利润的存在，技术传播并不是自然推进的。如养蚕缫丝技术的西传即遇到一系列人为障碍，由此说明对于具有垄断利润的商品及相关产业的技术跨境传播在任何时代都有限制或壁垒。

经济贸易往来带来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正是由于两汉的对外开放，沿丝绸之路中外商品、人员往来密切与频繁，从而使佛教东传，在此后的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纷争、政治上南北分裂、经济上遭受战火摧残，使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基础削弱，但在相对稳定的阶段和地域对外经济往来依然继续。

隋唐时期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引起了学术界长期的关注。但不少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文化、政治领域。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上的开放，提出这一时期除货物贸易繁荣外，服务贸易的开放更是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外商在中国从事的服务业涉及酒店、食肆等饮食业、旅店业、医疗业、零售业等，这些活动对于唐代国内贸易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唐后期对外开放的重心从西北内陆转向东南沿海，本书将其与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研究了开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是贸易重心形成的基础，而贸易重心或开放重心对区域经济发展又起了正向作用，这不仅在当代社会如此，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中国，由于有着相对活跃的商品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对当地经济发展同样有促进作用。

宋代基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对海外贸易空前重视，从而推动古代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高度繁荣的程度。本书研究发现宋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主要着眼于进口贸易，两宋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推动了以进口商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手工行业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使传统行业，如香药加工业、制瓷业的发展更加异彩纷呈。与此同时，在鼓励进口贸易发展的政策下，在海外国家货币铸造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中国铜钱外流也就难以避免了。这一发现纠正了将铜钱外流仅仅看作单纯的商品输出的传统观点及近来一些学者以现代思维将宋代铜钱外流看作贸易逆差的片面观点。宋代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使海外贸易日益突破奢侈品贸易的局限，不少日用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流通，如宋朝粗重的陶缸、陶瓮出口到东南亚，胡椒等普通香料也大量进口到国内，这种贸易活动直接有益于普通民众的生活。而占城稻的引进不仅推动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缓解了民众的粮食短缺状况，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改善。

随着欧亚陆海交通畅达，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政府政策的支持，元代中国对外开放达到了新的水平，开放的地域更为广阔，开放的领域也更为深入，通过对外开放使中外商品、人员、技术及文化得到广泛交流，对

于中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些微外向型经济的色彩。在贸易推动下的科技文化交流使中华文明得以长足进步，印度、阿拉伯医学、天文学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古大军西征加速了中国四大发明的输出。

毋庸讳言，元代中国的开放依然是在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下的开放，其政治、文化的开放更多体现了对域外文明的宽容，经济的开放主旨在于取得稀缺物资，增加使用价值，故而其对外开放的程度、规模、水平均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诸如由于一些军事、政治因素元王朝数度实行海禁政策，禁商下海。即使在开放海外贸易的时期，元王朝对出口贸易的商品、进出港口也有限制，由此元代的对外开放也就难以利用中国具有垄断优势的商品及技术赚取高额利润，进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到了明朝时期，中国封建政府一改过去积极主动地开放，变为严格限制政策，这一逆转长期被解释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日趋保守的产物，本研究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外部环境是对外开放政策逆转的诱因，而自然经济体系是根本因素，从而不但解释了明清时期趋向闭关锁国的短期及长期因素，也揭示了封建时代中国历代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固有的局限性。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东来，中西文化与制度的冲突不断加剧，使威胁中国国防安全的因素趋于复杂化，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受到国内经济结构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国际关系的左右。清前期为将西方殖民者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从多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使对外贸易活动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中国社会的封闭性日趋强化。同时，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即使在对外贸易限制最严格的“封闭”或“闭关锁国”时期对外贸易活动仍然在继续，局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还可能颇为活跃。

主要基于政治利益的中国古代对外开放，其经济基础极其脆弱，且对外开放在特定时期与封建政治、经济及文化存在冲突，使得这种开放的程度较低，范围较窄，在冲突激烈的时期开放政策也就往往逆转为封闭政策了。受自然经济形态制约，对外开放下中外贸易的开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就有限了，其更多体现为数量的、局部的效应，有限度的商品交流、技术传播对传统经济体系本身起了强化作用，难以引起质的变革。16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起步，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欧各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携带着坚船利炮纷纷东来，引起中西文化与制度上的激烈冲突。对此，中国封建政

府采取了消极防御性的闭关自守策略，结果不但未能抵御外侮，而且总体上的封闭使中国不能对变化了的世界格局有应有的认识，因而也就不能主动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当西方国家跨入新的人类文明时代之时，中国还在固步自封，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落后衰败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了。

孙玉琴

2012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MULU

第一章 两汉时期的对外开放 / 1

第一节 两汉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基础 / 1

第二节 对外开放路径的形成 / 5

第三节 两汉时代的开放政策 / 15

第四节 两汉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 / 18

第五节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 24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开放 / 3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基础 / 32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 / 3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开放路径的变化 / 42

第四节 中外贸易的发展 / 45

第五节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 53

第三章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 / 57

第一节 隋唐时期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基础 / 58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 / 60

第三节 隋唐时期对外开放路径的变化 / 67

第四节 中外贸易的发展 / 72

第五节 对外开放与经济文化交流 / 80

第四章 宋代的对外开放 / 93

第一节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 94

第二节 宋代的对外开放政策 / 101

第三节 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 / 115

第四节 对外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128

第五章 元代的对外开放 / 145

第一节 元代社会经济的的发展和造船航海业的进步 / 145

第二节 元代对外开放总政策 / 152

第三节 陆路贸易的恢复与衰落 / 159

第四节 元代海外贸易的兴盛 / 162

第五节 对外贸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183

第六章 明代的对外开放与封闭 / 193

第一节 明代对外开放的社会经济基础 / 194

第二节 明代对外开放与封闭政策的演变 / 196

第三节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 212

第四节 明代对外贸易的绩效 / 229

第七章 清代对外封闭与开放 / 247

第一节 清前期的经济发展 / 247

第二节 清前期“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演变 / 251

第三节 清前期对外贸易的路径 / 260

第四节 清前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海关与十三行 / 295

第五节 清前期对外开放的宏观经济效益 / 304

参考文献 / 340

第一章 两汉时期的 对外开放

秦 汉时期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封建经济日趋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对外开拓的步伐也逐渐加快，沿陆海两道中国与遥远异域的政治、经济联系也渐次发生，古代的对外开放由此逐步展开。

第一节 两汉对外开放的 社会经济基础

两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及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为对外开放提供了物质及技术基础。

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了汉王朝，经过多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汉初农工商业极度凋敝，为此，汉初统治者采取了“轻徭薄赋，与

民休息”的政策，同时大规模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致力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经汉高祖、惠帝到“文景之治”，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发展并日益繁荣，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空前提高，商品经济活跃。

西汉政府实施的休养生息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商业性农业也有所发展，一方面粮食的商品化率比前代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规模扩大，史称：“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① 这些专业化生产的产品既有消费类农产品，又有手工业原料性产品，因而其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活跃，而且为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汉代手工业行业广泛、门类众多，既有各种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消费品行业，也有冶铁、制铜等生产、生活工具制造业，这一时期丝织业、漆器制造业、冶铁业及铁器制造业的进步尤为显著。汉代丝织业无论生产规模还是制造技术均有显著提高。文献记载当时临淄的官营丝织作坊“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② 京师长安的东西织室，所需费用更高。民间丝织业主要以家庭副业形态存在，不少地方也是“环庐树桑”，“女修蚕织”。丝织品的产量大大超越前代，“庶人蠶老而后衣丝”的传统礼制被打破，不仅普通百姓开始著丝绸服装，甚至有些富人家“犬马衣文绣”。^③ 丝织技术又有了进步，河北巨鹿人陈宝光之妻发明了120综120镊的提花织机，可制造各种各样的花纹，工艺水平大为提高。从出土文物看，汉代丝织品的种类更加多样化，染色、印花技术也十分高超。见诸记载的花色品种有纨、绮、缣、绋、紬、素、练、绶、绢、缟、锦、绣、纱、罗、缎等十余种。织物色彩丰富，主要有朱红、深红、绛紫、墨绿，以及黄、灰、黑等色，并且侵染深透，色调也较为均匀。体现出了当时染色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汉代漆器制造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加速发展，组织形式分为官营和私营手工作坊两种，官营漆器作坊除少府负责的中央京师作坊外，各地郡县也有隶属的作坊，《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一些私营漆

①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汉）班固：《汉书·贡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器作坊也颇可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有因经营“木器髹者千枚”而富“比千乘之家”的大工场主。”近代以来在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及华东各地均有为数可观的漆器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曾一次性出土漆器148件,说明当时的生产规模庞大。汉代漆器制造业的生产分工细致,有负责供应原料的供工、制胎的素工、垸漆,糙漆的髹工、镶嵌饰件的上工、镀金的铜器黄涂工、描绘纹饰的画工、雕刻处理的雕工、综合性创造的造工、清理打磨的清工等。分工的细化必然带来技术的精进,造型精美、色泽亮丽,制造工艺精湛,普通漆器成为汉代人常用的日用器皿,而高级品则作为上层社会的装饰品或珍玩;冶铁及铁器铸造业在汉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一方面,地域分布更加广泛、生产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冶铸技术发生了全面进步。现已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涉及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内蒙、北京及新疆等多个区域。其中仅在河南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就有20余处。此外水利鼓风机广泛使用,使炼炉的容积扩大,有助于提高产量。同时冶炼时使用煤作燃料、石灰石作溶剂使铁的质量大为提高。汉代冶炼技术的进步还突出表现在脱碳铸铁、生铁炒炼成钢、铸铁脱碳成钢的技术发明,从而使各种铁制工具的适用性能进而是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冶铁的发展也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贾,如宛孔氏之先“用铁冶为业”,“家致富数千金”,四川的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①,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河南宛地的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

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商品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汉初虽然继续实行重农抑末政策,汉高祖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②惠帝、高后时,还规定“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③。但是正如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④商品经济十

①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分活跃，“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① 两汉时期，一方面商人拥有丰厚的财富，结交王侯，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縞”。^② 另一方面，贵戚子弟也热衷于追逐商业利润，纷纷经商，成帝时“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权为奸利者”^③，酷吏宁成声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④ 所以东汉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⑤ 正像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⑥ 两汉时期，由于利益驱使，出现了许多商人，商业成为很多人热衷的职业。

到武帝时，史载“七十余年之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⑦，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商业的发展带来市场的不断扩大，而汉代中国独具特色的丝绸、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及质量精良的铁制生产工具，不仅自国内市场广泛流通，而且巨大利益驱动下还冲破民族的、国家间的界限进入国外市场，从而导致对外贸易活动的发生。

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诸侯割据，各国家不仅攻伐不已，而且拥有各自独立的货币、度量衡体系，文字、车轨轨距亦不统一，并且通过关税、城堑、堤防等以邻为壑的手段人为割断各地间的经济联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随即实施了统一货币、统

①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汉）班固：《汉书·翟方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 （汉）班固：《汉书·酷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⑤ （南朝·宋）范曄：《后汉书·王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⑥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⑦ （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

一度量衡、统一车轨轨距、及统一文字的全面改革，从而扫除了交易的直接障碍。

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秦始皇还征发民众在全国修筑驰道，从而构筑了从中原到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史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①。汉代对国内交通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的修建更加重视，一方面由中央政府组织民力修筑开通跨区域的大道，如沟通云南与中原的西南夷道、联系关中与巴蜀的褒斜道等。另一方面，由各地方政府负责修缮辖区内的道路桥梁及邮亭，保障区域内的交通畅达。如东汉初桂阳太守卫飒在任时曾组织人力“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②，而那些“桥梁邮亭不修”的官吏在政绩考核中会被视为不称职。汉代国内各地间的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由此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为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节 对外开放路径的形成

两汉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沿着陆海丝绸之路两道进行。而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均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力量在漫长的时期里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当时世界上发达的经济体，中国在中外陆海交通上的努力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尤为显著的作用，同时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帷幕。

一、丝绸之路的形成与畅通

（一）丝绸之路的形成

大量的文献及考古材料证实，至迟在夏商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已和外界发生了经济文化交流，中原与新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南亚间已经有交通道路存在。中国丝绸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也已远销到西方，成为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产品，由此古希腊人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国”，意即丝之

① （汉）班固：《汉书·贾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南朝·宋）范曄：《后汉书·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